

# “教我飞翔”:余兆昌笔下加籍华人女性之 文学与文化研究

陈中明 贾洪波

**摘要:**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得主、华裔英语作家余兆昌从社会、历史和文化各个角度对女性身份做全面、深入、细腻敏锐的解读,塑造了既有独特性格、又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女性形象。本文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余兆昌塑造新型华人女性形象的三种方法:一、置女主人公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融合、冲突和相互挑战的环境中,打破封闭的华人聚居地(如唐人街)界限和男权至上的传统;二、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塑造人物;三、在儒家与道家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对主人公的性格进行阐释。

**关键词:**华人女性形象;男权与女权;中西文化融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0)2—0032—05

余兆昌(保罗·余,Paul Yee)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早期作品《教我飞翔,空中战士》到《草原寡妇》,从《三叔的诅咒》到《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作品中女主人公莎伦·冯、金美·余、莉莉安·钟和美琳·张都给读者留下了生动具体、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的作品宣扬一定的中国价值观念,探索其在新世界的意义。作品简单可读,赢得了儿童与青少年的喜爱,也吸引了无数成年人读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是被“边缘化”和“渺小化”的“第二性”(波伏娃)。本文尝试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余兆昌刻画加籍华人女性的策略及创作方法:一、其笔下女主人公处于不同社会背景 and 文化的融合、冲突与相互挑战的环境中,而非远离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打破了封闭的加籍华人聚居地的界限;二、从文化和历史角度对女性身份的形成进行解读,研究女性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影响。(参看克里斯多夫·李 2007:166—167)。

一方面,余兆昌笔下的主人公在融入加拿大

社会的过程中,自身价值观念有所改变,接受了相对进步或个人主义的加拿大价值观,质疑和完善某些贬低和压抑女性的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如对孝的膜拜和仪式)。另一方面,余兆昌基本肯定了道家和中国佛家的个人主义信条和实践行为。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力量——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精神的等等——塑造着女主人公复杂、多样的身份。他塑造的女性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两文化精华,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软弱、压抑人性的成分。

## 一、个体和社会环境

理解余兆昌作品中女主人公身份的形成,首先应该掌握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因为移居到加拿大,尤其是唐人街的中国人在当地建立起来的是与国内同样的、根深蒂固于几代中国人心中的秩序与结构。这种秩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二、以男性为中心,厌恶和压制女性(参看 Overmyer 1991:91—2)。儒家思想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庭式的

结构,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的关系,前者照顾着后者,同时要求后者绝对地服从。这种等级关系涉及社会中每一成员,女性在这等级之塔的最下方。

余兆昌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的社会关系,他通过华裔女性在加拿大的经历来塑造女主人公。女主人公的成熟不是在一个中国家庭、也不是在狭小的华人社区中的成熟,这些华裔女性超越了这一空间,进入到更为丰富的加拿大文化中。在《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第三代移民莎伦和白人女孩克里斯汀·托马斯——一个“足球明星”——往来,目的是质疑香港新移民参孙心中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地位。在这里,她获得了大喊“她们(女性)能够这样”的权利。余兆昌用同样的方法刻画了莉莉安。父亲不在的情况下,她必须反抗她愚蠢的、歧视女性的三叔要把钟家所有的女性——她的妈妈、她和其他两个女孩——送回中国的企图。余兆昌写道,当莉莉安在唐人街挨门挨户找工作失败后,是贝尔夫人,一个白人女性,帮助了她,雇她为女佣。这一工作合情合理地使她从一个封闭的中国家庭和群体中走出,进入到一个新的、相对而言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而且也给她一个机会去寻找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秘密筹集资金的父亲。在这里,来自白人的影响和帮助是非常关键的。成人故事《草原寡妇》在抵制来自温哥华唐人街的诱惑方面,走得最远。戈顿的遗孀金美·余,固执地回击了她侄子蔑视的话语:“你是一个女人,你知道吗?”经历了激烈的心里斗争之后,她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只有几个中国人的草原上。这些女性都努力地走出了中国家庭,甚至华人社区,她们至少开始融入到白人文化中。实际上,是中国的家庭以及由它产生的男性至上的态度,促使中国女性接受了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价值观和行

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余兆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融入到加拿大文化中的美好图景。如果中国女性对家庭中父权人物或中国移民中某种族长式人物的反抗失败,悲剧就不可避免;当然也存在白人或白人文化无法进入到中国文化中的现象。《禁果》冷静地记录了农场主冯扼杀了女儿和农场工人约翰逊的爱情。草原上的孤立以及缺乏强有力的加拿大群体导致了她的顺从与屈服。同样,在《儿子

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害怕华人的指责,偷偷地回到中国,把双胞胎女儿换成双胞胎儿子带回温哥华的唐人街,作为自己生意的继承人。他妻子除了忍受内心的痛苦,毫无办法。梅商人回到中国意味着他对男性至上、歧视女性的价值观的认同: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的香火。余兆昌似乎在说明,只有通过充分的跨种族交往,中国传统的男性为主的价值体系才会遭到挑战。如果华裔女性永远停留在中国家庭的范围内,她们中的大多数则很难摆脱这一价值体系。

余兆昌的作品对加拿大镶嵌板文化中相对较小的中国人群体进行了讽刺,其精彩在于女主人公的聪明与才智被出乎意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女性能力先是被否认,或女性被剥夺了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她们被限制于家庭里,她们的声音被男性的强音所掩盖,如莎伦的哥哥、莉莉安的三叔或美琳的当饭店老板的爸爸之所为。在女性才智显露之前,女主人公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也不曾意识到或发现她的价值,家庭以外的人更无从获知。在《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莎伦经常被她的陪衬参孙、甚至她的兄弟艾迪所激怒,他们嘲笑和贬低的话语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年轻男性的沙文主义。然而余兆昌在最后设计了一场放风筝的场景,在基奇兰娜公园所有观看放风筝的人前表现她精湛的技巧。

《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父亲把女儿锁在厨房里,计划使两个儿子篡夺本属于女儿美琳的荣誉,但这种企图最终失败了。当来访的中国总督无意间让这个女孩在大家羡慕的眼神中展示她无以伦比的“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这道菜时,女性的才能被显露,被认可。余兆昌安排美琳对这位总督说:“这是新世界的一道菜,在旧世界是无法复制的。”在此,余兆昌说明了文化合成的作用。“这道菜”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她精湛的厨艺不但公开证明了她独特的才能,而且表明中国移民融入到加拿大的过程中,加拿大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余兆昌在其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三叔的诅咒》中,对女性的智慧和军事才能的认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莉莉安英勇无畏,她的名字被中国人社区、唐人街,乃至整个中国(由于孙中山的缘故)所熟悉。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特

殊性,只有那些掌权的男性才能对女性的作用给予公开的承认,没有一个女性位高如此。恰恰是否认女性价值的人才有可能完成对女性价值的迅速认可。中国人是以家庭和集体为核心的,相对于更为个性化的白人群体,女性更可能通过不断的、甚至有碍他人的集体活动来表现她们的作用。

在余兆昌的小说中,中国家庭和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秩序和习俗被广泛确定的超稳定结构。它给中国家庭和华人社区提供保护,带来稳定和繁荣,但它也把人类等级化,使女性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底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由于它具有彼此相关、以家庭和社会为重心的内视性社会结构,使得其在某种情况下,会马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为女性提供展示她们才智的机会,所以余兆昌小说对女性才能的展现过程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在莉莉安和美琳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挣脱来自家庭 and 社区的种种束缚,真正摘取了个人成就的荣誉,使人们开始质疑“男性就是比女性强”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

## 二、历史和“她”的故事

在重新思考女性作用的时候,余兆昌娴熟地运用中国故事、神话、传说和历史资料来加强这些人物与中国的联系。在一个尊重长者和智慧的文化中,通常由一个年纪大的、有远见的男性起教育者的作用,而不是女性的父亲。当女主人公不得不从英文或中文学校辍学的时候,这些故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诅咒》中,瞎眼人讲述了修建雄伟长城的故事,培养莉莉安对中国事物的情感;而卡里布·荣对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慢慢介绍帮助莉莉安了解她父亲的无私与勇气。由此,莉莉安获得了把她和中国的过去紧紧连在一起所必需的知识。在《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莎伦主要是通过故事才知道了一个遥远的叫中国的国度。老人在讲述自己于加拿大独身生活的故事中,时常流露出孤独和想家的情感。这些故事不但把中国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也激发了莎伦的梦想。只有在聆听这些故事之后,莎伦才对这个有特殊爱好的老人、对中国民间充满仪式与象征意义的放风筝习俗有了真切的理解。在此,余兆昌使莎伦获得了一种和老人相似的感受,即使这种感受是短暂的,也使她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那种蕴含着同情与共感的真切的忧伤使读者明白这是放风筝行为背后的文化与心理共鸣。

在表现女性的勇气与智慧时,余兆昌经常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神话中当权男性的行为进行讽刺性的扭曲。余兆昌运用类似于美国作家汤婷婷在《女战士》中采用的方式,把曾经处于中心地位的女性,即克里斯蒂娃在《关于中国妇女》中所说的“处于中心的母亲”,重新置于发号施令的位置。有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说的母系社会。余兆昌具有的丰富历史知识使他的创作动机得到巨大的发挥:恰恰是在犹豫和抉择的时刻,传颂古代勇敢的杨门女将的歌曲不断地在莉莉安耳畔回响,激励她下定决心:

剑锋交并,火花飞溅,  
刺杀、躲闪,母子奋力接战;  
母亲占了上风,  
胜利在握,神机妙算:  
儿子明亮眼中火光闪,  
让他摘取荣耀,加入同一战线。

——(《诅咒》)

在古代,年轻男性要获得女指挥官的许可才可以参加战争。莉莉安受此激励,要与男性一争高低。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她必须迈出第一步。当她大声喊道“我不是一个小孩,我要离开”时,她实际上是摆脱了妇女是弱小的、从属于他人的陈规老套,而这陈旧的认识模式只是在后来才得以发展、变化。莉莉安的举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推而广之,余兆昌在此表明所有女性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从另一角度讲,莉莉安的决定也是重要的,当她离开家——这个在传统上束缚中国女性的“家庭圈子”(参看 Buss 1989: 1)——的时候,她走进一个公共空间,甚至进入政治领域。在这更广阔的空间,她展示了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公共基金募集,还是加籍华人捐资者的身份和安全问题都取决于她的努力。余兆昌认为,尽管在孔夫子的忠孝观念下,中国传统由于轻视女性能力而受损,但它也能转化成促进女性事业和女性解放的养分。

历史学家出身的余兆昌(参看《咸水埠》Salt

Water City 2006),在其作品中娴熟地运用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所接受的革命理念。这两者的结合使莉莉安既是历史上真实可信、现实的女性形象,同时,从革命的角度讲,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形象。莉莉安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是在身体和心理层面开始处理成长中的痛苦和性觉醒。莉莉安的成长,其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步的。父亲要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意志,就是莉莉安生命的意义。因此,在莉莉安身上,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在彰显莉莉安和所有投身于这场革命的中国人的崇高和伟大的时刻,这种浪漫主义刻画才真实可信。个人生活的改变,尤其是社会底层妇女生活的改变与国外中国人的命运(相对于其他加拿大人)和中国整体发展命运(相对于外国势力和满族人)是分不开的。若把这些问题分开,莉莉安就仅仅成为追求个人成长的扁平的、传统的人物。这个年轻女性的故事和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这场即将来临的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余兆昌的作品大胆跨越个人和集体、家事和政治的界限,揭示了中国人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是一整体关系的信念。

### 三、中国的价值体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在作品中,余兆昌通常不对价值体系做详细阐述,但潜在的价值标准可以追本溯源到儒家、道家的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总体上,余兆昌对儒家教义和伦理标准既有接纳又有所摒弃,对道家思想则持赞赏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加籍华人家庭给予子女灌输大量的儒家思想,而路易斯·阿尔杜塞(参看 Louis Althusser 1989: 81 - 82)强调的“学校”对余兆昌笔下女主人公道德标准和性格形成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中国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价值标准。在作品中,余兆昌表明了对儒家提倡的勤奋和义务、至善至美、做贤人智者和重视教育思想的赞同,对孝这一概念流露出矛盾的心情,对歧视女性的态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则进行了批驳。

余兆昌对古老的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儒家家长式价值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挑战。他创作了即使不比男性强,也和他们

一样有能力的女性形象。在《儿子与女儿》中,尽管父亲企图抛弃自己的双胞胎女儿,故事却以这两个女儿成为梅氏生意的真正接班人而结束。《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美琳才是张氏餐馆最好的厨师,那两个懒惰的男孩则成为公众的笑柄、家族的耻辱。余兆昌尤其强调加拿大社会环境和新世界的价值体系对女性的影响,尽管后者常常散见在故事中,以隐约的形式存在着。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女性缺乏公正对待进行弥补的企图。在《草原的夜晚,1939》中,读者可以看到克服中国传统心态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在这里,戈顿不是没有意识到对女婴的歧视,而他母亲无意识中存在的要男孩的家长式意旨以及恳求他回国的行为才使他更为痛苦。因此,他放弃多年努力经营的饭馆、屈服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承担起对中国家庭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回归中国(如戈顿所为)暗示着对古老的中国价值的崇拜。居住在加拿大并不意味着对加拿大价值的全盘接受,但就女性而言,余兆昌对这两种价值的比较结果表明:新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更有利于女性。

为了避免降低其青少年小说的娱乐性,余兆昌克制笔端,不对某一生活哲学做详细分析,而在他的成人小说《草原寡妇》中,这方面的阐述是十分明确的。就像孟母为了儿子孟子(儒家体系的第二代宗师)而三迁其居一样,这里的母亲(余兆昌一个稍经粉饰的近亲原型)考虑到要从精神生活枯燥、文化保守的萨斯喀彻温省搬走。但是在新世界,余兆昌没有给予儒家思想以全部的认可。母亲发现丈夫缺乏对孩子们喜欢游戏和玩乐的共鸣,在一系列表明夫妻之间缺乏沟通的内心独白中,她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戈顿扮演了儒家思想中冷酷的父亲形象,男孩只是争论的另一个话题。”在此,儒家思想的两位大师同时出现,但都以反面形象现身。金美对众所周知的孟母三迁故事的讽刺性解释在思想上赋予她一种能够呆在白人中间的力量,而她和孩子们在草原上乏味孤独的生活则被归咎于严肃的、孔夫子式的丈夫身上。

颠覆的行动必然带来肯定的行为,余兆昌也重申一些儒家美德。白人女孩克丽丝·托马斯可以代表我们说明意义:“有时,很容易看到亚洲人(加籍华人)身上很多她不具备的东西——工作勤奋、听话、举止得体。”(《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

星》,《教我飞翔》)很多人认为对教育的特殊重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也是亚洲学生在北美大学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参看 Duke 1989:39; Overmyer 1986:15)。余兆昌的小说也宣扬这样的思想。在《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一直担心儿子的成绩,不停地唠叨要儿子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一些相关的描写如下:“一天,他(参孙)带回家一张得了满分的考卷,他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她认为参孙不能仅仅是和白人孩子一样好,他必须是更优秀。实际上,参孙的母亲和《出走》(Runaway)中的刘绮芬(Evelyn Lau)的母亲是一样的。她们都要求子女获得最好的成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刘绮芬考试得的89分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分数,母亲要保护她而对她有更高要求的做法最终使她厌烦并促使她离开家。相反,余兆昌却通过使他笔下人物听从父母意见而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来明白无误地表明对这一儒家思想的赞同。

在上文中对参孙母亲心态的分析,以及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对莎伦的刻画表现了儒家要求至善的美德。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努力工作,而且全面地培养自己的性情,人就可以成为智者(参看西罗考尔 31-32; 41-42)。我们再次从克丽丝的角度看:“她把莎伦看成一个成绩和长相完美的‘好的’中国小孩,而克丽丝则被大多数老师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学生”(《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在克丽丝的眼中,她这个加籍华人朋友不但擅长学习,而且长相无可挑剔,行为无可指责。假如一丝理想主义情绪影响了克丽丝的判断,余兆昌试图建立起来的为了竞争而具有的理想和模式即是明确的。儒家在学业上和社交行为上的完美主义标准就是余兆昌的标准。尽管他质疑和反对某些儒家价值,他也在保护着某些有价值的思想。他并没有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儒家教育广泛地涉及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道家思想则具有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点,强调如直觉、自发性、个人体验和启蒙、甚至某种具有神秘色彩的行为。余兆昌的作品把孩子般的天真无邪、简单和复杂巧妙的创作手段与技巧相结合,创作出立足于现实生活环境,而能达到一

定精神高度的女性形象。以道家思想为依据,余兆昌笔下女性潜力的实现没有先入之见,没有界限,没有模式。

道家思想中重要的一条是技能和完善自然而然地来自于不断的实践和实际经验,而不是取决于既定的性别。余兆昌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受益于这一点。他注重培养女性开辟新的领域、跨越传统的男孩应该做什么女孩应该做什么的性别界限的勇气。《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这一节刻画了努力向男孩证明女孩“能够”像男孩一样踢好足球的莎伦和克丽丝。这两个女孩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取得了成功,而不是由于纯粹的机遇或技能获得的。更有意义的是,余兆昌让这两个女孩的表现超过了嘲笑她们的那三个男孩。余兆昌大量运用传统的道家和中国佛家思想,不但加强了作品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而且重新塑造了女性形象。

总之,余兆昌的道家智慧不仅仅教授自信、独立、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还强调基本的、实用技术的重要性(如《诅咒》中的缝纫、烹饪、照顾年幼者等)。他笔下的女孩或女人擅长曾只属于男性的体育、武术等运动。余兆昌为其读者,尤其是女性,打开了施展才华的全新天地。

可以说,余兆昌的小说世界文化内容丰富复杂,他通过描写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深刻地探究加籍华人家庭和深层结构。他置主人公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使其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他批判地检验中国文化(儒家和道家文化)基本精神、道德标准,以矛盾的眼光审视以唐人街为缩影的关系盘根错节的中国群体和文化统一意识。如果余兆昌笔下的人物永远地离开唐人街,她们与中国文化的分裂则过于极端。余兆昌指出中国文化中一些不受欢迎的成分,但中国的家庭,以及它所提供的保护、温馨、帮助以及在道德培养上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大多情况下都得到了积极正确的对待。

作者陈中明,男,现兼职于加拿大环球中华文化与中医学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内蒙古大学访问教授;贾洪波,男,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